

6-2014

「服侍最小的弟兄」：七、八十年代天主教的社會行動

Shun Hing CHAN

Lai leng LAU

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: <https://commons.ln.edu.hk/thinkinghk>



Part of the [Critical and Cultural Studies Commons](#)

Recommended Citation

陳順馨、劉麗凝 (2014)。「服侍最小的弟兄」：七、八十年代天主教的社會行動。《思想香港》，第四期。

This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Kwan Fong Cultur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gramme 群芳文化研究及發展部 at Digital Commons @ Lingnan University.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思想香港 = Thinking Hong Kong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Digital Commons @ Lingnan University.

「服侍最小的弟兄」：七、八十年代天主教的社會行動

Cover Page Footnote

標題為編輯所加。

受訪者：陳順馨

訪問及整理：劉麗凝

思想香港 第四期 「基督教與公民社會」

《「服侍最小的兄弟」：七、八十年代天主教的社會行動》

(題目為編輯所加)

受訪者：陳順馨

訪問及整理：劉麗凝

(為何當年會參加 KATSO?)

我 1973 年接受領洗。

(你是天主教徒?)

是，不過我很久沒有去教會了，所以當我入讀理工大學後就參加天主教大專聯會，當時每一個 KATSO 都有一位神師，我們的神師是關尚義神父(John Clancey)，即是現在做人權律師的那一位，電視經常報導他處理有關人權的法律個案，他以前是神父來的，是瑪利諾神父，來自美國。

(這些神師有甚麼分別？例如瑪利諾及 PIME)

是來自不同地方的教會，瑪利諾是美國，PIME 好像是意大利。當時最活躍都是這幾間教會，其實活躍的只是數位神父，而不是教會。這是三個來自不同國家的天主教教會，通常都是外向性的，例如 PIME 稱為「米蘭外方傳教會」，全部是差派神父往外傳教，這幾個是在香港較具規模的天主教教會，而其中有部份神父在社運層面是較為活躍的。大家的角色是不太一樣，例如瑪利諾神父的 John Clancey 與韓神父參與 KTIS(即：觀塘居民諮詢服務)，發起人是 Hummert 神父(韓德民神父)，所以 Father Hummert 和 Father Clancey 都是同一代的年輕神父，所謂年輕是指大概三十至四十歲左右；他們同屬於同一代的瑪利諾神父而又活躍於社會事件，而 John Clancey 就更參與在社會運動上，Father Hummert 就傾向在服務層面，所以 Father Hummert 跟葉錫恩聯手開辦 KTIS。

當年市政局只有少量的民選議員，葉錫恩是其中一人，他們會接見市民，而韓神父本來在橫磡區協助葉錫恩，但後來發現觀塘新市鎮的居民專門走到橫磡村找葉錫恩求助，於是後來有人提議我們在觀塘也開設服務，所以我們借了牛頭角明愛中心的一個房間，韓神父就找了我們這批義工幫忙，然後葉錫恩前來接見市民，但這中心並不是以議員命名的。

(是天主教借出這個地方?)

我們是透過明愛借到這個地方，每逢星期一就會接見市民，我們除了會等候居民前來外，韓神父也會帶我們出外探訪安置區或收容房，原因是 70 年代的房屋問題非常嚴重(例如擠迫戶問題)；其實艇戶事件也是房屋的問題，所以我們會前往最基層的家庭去做探訪。John Clancey 是專門參與學運，他同時也是天主教大專聯會的神師，當時天主教大專聯會會有三位神師。

(KATSO 和大專聯會的關係是甚麼?)

天主教大專聯會是 KATSO 的大專聯會，近似學聯與學生會的關係，天主教大專聯會的會址是界限街明愛中心，都是天主教的場地。我們 KATSO 就好像天主教大專聯會的屬會，每個 KATSO 都會派人參加大專聯會的活動。天主教大專聯會有三位神師，包括 John Clancey、Father Hurley (余理謙)及香港神父譚坤。這批神師現在也差不多七十歲了，我也六十歲了，當我讀大學時他們擔任我的神師，我猜他們的年紀比我要大十年左右；天主教大專聯會較活躍於社會運動，其實都跟這些神師有關。

(在 Clancey 來之前聯會是否都如此活躍於學運和社運？還是依靠神師的取向？)

我認為神師的帶動是有影響的，不同的神師會帶領不同的院校。John Clancey 是理工大學的神師，他沒有指示我們做很多事情，但強調關心社會是一個前提，所以當年我們 KATSO 會自稱社會派，強調關心本地問題，是有別於國粹派的，這些都跟神師的傾向可能相關。70 年代一些較為前衛的神父，不少都是受到解放神學的影響，解放神學源自拉丁美洲，當時拉丁美洲有很多獨裁政府，而在整個民族解放運動中，教會其實是扮裝演了很重要的角色，就好像菲律賓當年反馬可斯的獨裁政府，當時有很多活躍的天主教與基督教領袖參與了反獨裁政府的示威，雖然這些菲律賓教會比較低調，但在拉丁美洲的教會卻是很強的，他們建立了一套「解放神學」，主張要介入社會，甚至要參與革命。香港的神師也受解放神學影響，而香港 70 年代是殖民時期，再加上左翼思想在香港也有點土壤，所以除了國粹派，我們都算是「左」的思想，另外當時還有托派和無政府主義，都是有較清晰的意識形態。在教會層面來說，就是「解放神學」提供了思想資源，所以教會與社會有共通點。

(為何七十年代左翼思想如此興旺？馬國明曾提過 74 年大專聯特別提出了「Option for the poor」的口號，即與貧窮及受壓迫者站在一起，是一個很清晰的轉變，你是否同意？另外從馬國明的訪問中，因為當年他們為《曙暉》舉辦籌款書展，然後馬國明就發函給不同的出版社，最後回應馬國明的主要是左翼的出版社，因而引入大量左翼書籍，例如葛蘭西的《獄中札記》)

對，當時這本書非常流行。這件事我真的不知道，雖然我知道馬國明舉辦書展，但因我不是搞手，所以不太清楚這種偶然性的出現。我對「Option for the poor」這口號不太清楚，但當時天主教覺得要走社會行動，對我來說就是受「無論是誰，為我最小的兄弟而做，就是為我而做」這一句所啟發，你要服侍最小的兄弟，對我來說即是最基層的人，那是一個很清晰的訊息，我們要走到最貧窮、邊緣的社區，幫助受壓迫的人。

(這種想法只是在天主教流通，還是在社會也有這種想法？)

那一句聖經經文應該是很有名的，但實踐起來可能存在差異，例如相比我的堂區觀塘聖若翰堂，那邊都是瑪利諾神父，連我的小學聖若翰小學也是附屬於瑪利諾，但後來因著本地化的過程就把教會還給本地的神父，但本地的神父跟我們的模式不太一樣，所以後來我離開了堂區。我記起有一年九龍灣的安置區發生了火災，於是我連同幾個女生走去找謝神父，建議他在彌撒時收取一個臨時的奉獻，為災民籌款；但神父說不同意，因為他們打算為教會的裝修籌款，當時我們質問：「到底教會的裝修重要？還是協助無家可歸的人重要？」最後這神父拒絕了，我們很忿怒，而且跟我們的信仰存在衝突，我以為教會都認同和「為最小的兄弟而做」的價值，但實踐起來完全是兩回事，於是我慢慢地離開了這間教會。我相信我們要去實踐這價值，所以我早期行動的動力是來自信仰的教導，那時我還未讀社會主義及其他理論。我不是熱衷於讀經、期盼上天堂的那種人，而且相信天堂應該在人間，所以這變成驅使我去行動的力量。你問為何當時的年青人會走這條路，我覺得脈絡都是重要的，因為當時殖民社會出現了很多問題，當時也不太認識中國，所以較多去看一個本土的問題，而 KTIS 是一個令我共同參與的平台和契機。

(所以你在 KATSO 的活動主要在 KTIS 的服務嗎?)

我同時參與 KTIS 和 KATSO 的活動，我由 73 年開始做 KTIS，在 74 年入 KATSO，所以當年認識馬國明，然後一直做到八十年代，包括艇戶事件，直到我到荷蘭讀書才停止。

(你在 KATSO 參與甚麼活動？例如出版、聲援?)

其實 KTIS 後來由個案轉到參與運動，例如艇戶事件，所以多了通過 KTIS 的這渠道參與社運。至於 KATSO，我沒有參加《曙暉》，因為我當年擔任靈修幹事，所以我負責舉辦退修等活動，我還記得我當年跟屠凌珠...後來屠還跟 John Clancey 結婚，她跟我在聯會是同期，我最深刻當年和她一起做大量 survey，可能因為我當年讀數學統計電腦，在聯會這平台裡也做一些計劃或研究，而不是靈修。當年有一個天主教青年聯會，出版了一份刊物《青年》，我也會投稿的。「金禧事件」也有一起參與，當時就是聯會一起去行動。金禧發生在 77 年，77 年我已大學畢業了。

(我記得金禧事件，聯會的身份是非常尷尬。)

因為是天主教學校，所以天主教大專聯會是很突出的，但詳情我不太記得了。金禧事件是第一次揭發教會內部的黑暗面，因為校長出現問題，後來這校長辭職，金禧就分成五育中學和德蘭中學。當年金禧事件的學生，後來成為社運份子，這件事培育了很多中學生參與社運，這是非常罕見的，所以是大事件來的。當年金禧老師帶著學生，所以師生成為主體，然後一路支援他們，支援要公開帳目，最後更演變成停課，以及分裂為兩間學校；五育就接收所謂激進的學生、不太激進的學生就回德蘭中學。後來有一個去了香港社區組織協會(SOCO)工作的好姐，就是金禧年代的中學生領袖。

當年我認識陳寶瑩(托派)，是江瓊珠拍《革命女》的主角，何芝君與江瓊珠透過拍攝一系列人物去串起社運歷史，其中一個是《革命女》，以陳寶瑩為主角，由革馬盟至到托派，長毛也是革馬盟，即是革命馬克思主義聯盟，跟托派的歷史有關。

(當年社會派跟托派關係密切?)

沒有，反而是社會派防範托派，因為托派經常「撬走」領袖，每場運動都有不同的領袖出來，例如艇戶代表、學生代表，當時托派被視為搞滲透，然後坐享其成；因為一個運動從籌備、開會、行動、培育領袖都是長時間的投入，而托派就用一些很激進的思想去吸引他們，例如「改變」、「改革」，其實詳情我不太知道，但就是有這樣一套講法，就是托派很喜歡去滲透，然後吸走精英，把他們政治化，其實托派就是希望把事情政治化。我們這一種由學生至學聯，或是天主教大專聯會，我們之間都沒有很清晰的意識形態，所以托派不認同我們，認為我們是改良主義，他們提倡要把事情政治化，也很容易轉化領袖的人物，為他們提供意識形態之餘，亦更組織化和政治化，這就是當年流傳要防範托派的原因。後來我們在 1984 年成立婦進那一年，我、陳寶瑩與江瓊珠是最早期婦進的創辦人，之前我在荷蘭讀書，但不知道自己的導師原來是屬於托派的，我只知道他是英國人，會搞工人運動，所以很明顯的，但我後期才知道是「第四國際」；有一次導師跟我說有一個女生來了荷蘭開會，然後問我有沒有興趣見面？當時我在海牙約了陳寶瑩，原來當時陳寶瑩代表香港的托派到荷蘭出席托派會議，而寶瑩在金禧事件時已經是一名很突出的領袖，她的聲音很沙啞，是很容易辨認出來，我們一見面就認得對方。

我們當時覺得托派內的男性主義非常主導，所以我們也開始思考一些性別議題，而荷蘭又是我的性別啟蒙時期，所以我們提出當我回到香港後再會面。我畢業後回港就找陳寶瑩和江瓊珠，說起江瓊珠又是相當有趣，江瓊珠與天主教大專聯會另一班人搞了一個公社，名為巴芬道公社，馬國明也住在那裡，在天主教大專聯會附近。當時住了一班人進行公社式的生活。馬國明、John Clancey、屠凌珠等活躍的天主教徒就住在巴芬道公社，江瓊珠亦曾住在那裡，馬國明住的時間最長。後來江瓊珠結識陳寶瑩，而江瓊珠亦開始閱讀一些女性主義的書，所以我們三個開了關注婦女問題的讀書會，這個讀書會就變成婦進的前身，因為後來我們覺得不能只讀書，而是應該要去搞行動。因為寶瑩是托派的行動派，而我們又共識要去實踐，所以就開始成立婦進，然後拉一班人加入婦進。

最近我們被問的是社會派對托派的看法，因為擔心托派會「搶人」，所以當婦進成立的時候，我們身邊的一些盟友就說：「你們婦進被人滲透了。」我知道他們在說陳寶瑩。我回答說：「我知你是指的是誰，我在很久以前就已經知道，如何婦進如此容易被滲透，散了也不可惜。」沒那麼容易的，我覺得我們是比較包容的，因為我們是有共通點，所以才走在一起，如何真的有滲透然後每個人都成為托派，那就代表它很厲害，但事實上是否真的如此容易？陳寶瑩到現在仍是會員，她會推動基層層面的工作。後來婦進沒法維持的基層路線，因為我們當時欠缺職員，我們這些會員每天下班後就趕到婦進工作，是非常投入的，不過仍很難維持的，所以後來唯有放棄這條路線，即是基層組織的工作，所以寶瑩不太認同婦進就是這些路線，因為她可以保持到自己的路線，但不緊要，因為這個會有來自不同背景的人，我們會討論這些問題，但同時又不會由一個人左右整個婦進的方向。結果我們沒有解散，亦沒有人變成托派，每個人都可以保留自己的看法，所以當年社運之間會有這些想法。

(那麼國粹派呢?)

國粹派去到 79 年艇戶事件...因為當時四人幫已經倒台，其實是一個意識形態崩潰的年代，所以當年國粹派都消失了。我們這些自稱社會派的，後來就走去看看社會主義的問題，因為以前不認識中國，因為通過反思殖民主義、香港本土的問題，殖民主義當然扣連資本主義的問題，我們通過很實在的本土思考，其實會了解到資本主義是有問題的，所以當資本主義不好的時候，就會嘗試看社會主義是甚麼，從而開始看中國的事情，或是社會主義國家的事情；所以為何後來我前往北京讀書，就是因為這個背景脈絡。我想去了解社會主義的實踐，至少觀察最近距離的中國。就算是實踐層面出現問題，到底是理念有問題，還是理念與實踐存在落差？所以我去看看有關社會主義的東西。

但國粹派是一個從上而下，認同一個由中國而來的意識形態，或是當年文革、四人幫很激進的路線，而在香港則要「認中關社」，雖然他們也會走出來關心社會，但最終是文革式的反資反殖，但當你國內的意識形態倒塌的時候，即四人幫倒台後，整個意識形態就失去了基礎，因為沒有本土的基礎，所以就轉型去建立專業、個人化的生活，而可以流入社運的人就很少。

很多社運派的人，港大、中大學生會在艇戶事件比較活躍，當年最活躍的是香港大學學生會，因為港大學生會是社會派的，但理大學生會就不太理會，所以社會派會參與較多，如果我們看傳承就有這樣的一面；例如 呂大樂、吳俊雄等人是香港學生會的

(當年甚麼人會加入學生會或 KATSO?)

學生會、學生報吸引很多人加入，KATSO 就一間間院校，很視乎誰擔任神師，我印象中浸會、港大的 KATSO 不太活躍。

(所以中大和理大的 KATSO 最為活躍?)

因為理大學生會是國粹派，所以主要是認識中國。

(馬國明曾提及波蘭團結工會.....)

哦，當時是東歐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變化，因為自五十年代開始蘇聯，史太林逝世，赫魯曉夫上台後修正過去的極端主義，所以他的意識形態慢慢地鬆動了，也引起整個東歐都開始出現鬆動的情況，所以有些知識份子也創立一些團體去偏離以往的思想控制，所以為何後來毛澤東推動文革，就是防止跌入修正主義邊緣，因為東歐開始出現變化，毛澤東因為擔心所以要推動文革去消洗。南斯拉夫、波蘭、捷克等地都發生事件，而波蘭的團結工會名氣最大，不像中國那些紅色工會，所以團結工會偏離了思想，要求民主、獨立工會...所以當年東歐成為香港左派學生的參照對象，當年團結工會領袖華勒沙嘗試脫離意識形態深嚴的一種經驗，如果用馬國明引入左翼書籍來港的話，一定會有華勒沙的工會經驗，所以當年香港的思想資源，解放神學是一種；國粹派的意識形態是一種；另一種是東歐裂變的經驗。所以華勒沙的團結工會經驗，我們會參照這些書籍，了解他們發生甚麼事情，以及了解他們組織的方法。

(當年學習左翼思想是否很「潮」?)

沒有這種想法，即不會考慮是否要追上潮流，而是感到有實際的需要。因為我們正在思考這些問題，你一定會想參考不同的思想資源，所以我們會不斷搞讀書會，例如婦進的出現與讀書會有很大的關係，所以思考迫切性的原因較大。

(你認為 KATSO 對你的影響有多大？對大專院校、社會的影響又如何?)

如果個別 KATSO 的影響不大，但通過天主教大專聯會參與社會事件，其實甚少以個別 KATSO 的名義，例如甚少用理工天主教同學會的 banner，主要用天主教大專聯會的。個別學生會曾視乎他們的傾向，因為學生會是比較政治化，真的有很多國粹派滲作學生會，反而托派是滲入不了，國粹派就是所謂中共地下組織，可以滲入學生會，背後就是他們在操控的。

(他們是甚麼人?)

例如理大有一位同學，其實在他還是中學生的時候就已經被選中了，這些組織會選精英學校，例如我的朋友來是拔粹女書院這些精英的英文中學去發掘精英學生；甚至他們中學畢業後選讀哪一間大專院校和選系，甚至要他們加入學生會，都是由組織安排的，這可能也解釋了為何理大學生會主要是國粹派。當年學生會的會章、文件都需要經過地下組織過目，他們已經變成地下小黨員，已在其網絡內變成地下的工作；如果用文革的思維來理解，毛澤東都是想中國好才會推行文革，當我在理工的時候中國仍是文革的時期，他們相信要將香港反資反殖，所以他們要保證這個運動不要走歪。

(這個運動是指?)

這個運動是指學生運動，所以才滲透入學生會，背後所有東西都是經組織過目，保證不會走錯路線，要跟隨中共的路線，所以才需要有人去監督，其實從以前開始就是以這種方式搞革命，這是中國搞革命的模式；地下黨就是這樣，都是慢慢滲入不同的組織，然後轉化他們的思想，所以當年在香港都是搞革命，整個組織就像中國共產黨當年搞革命的模式，即所謂「單線聯絡」。它是從頭到尾只跟一個人聯絡，你不清楚其他人的，你只向一個人負責；其實 70 年代是一個很政治化的年代，所以學生運動是很政治化。所以近年我們說港大學生會有滲透，其實這絕不是新鮮的事情，早在 70 年代已經是這樣，即中共有一套的手法其實在運作中，歷來都是這樣。中學時期已經開始接觸一些對象，然後安放他們在大專院校裡，監察學生會，甚至將大學變成國粹派的大本營。例如港大活躍的學生不是國粹派的，學生會就會轉去其他路向；所以港大學生會或天主教大專聯會一方面有較強的本土參與，另外他們亦有建立自己一套方式去吸引年青人，例如「解放神學」、「第三世界思考」...六、七十年代是很激烈和裂變的年代，例如巴黎公社或一些歐洲經驗，你是可以從這些事件汲取經驗和參考，所以學生會和學生報都是學生運動的大本營，可以累積有心的、或行動的學生。

(所以國粹派難以滲入港大、中大的學生會或天主教大專聯會，其他的學生會，如理工大學就較容易被滲透了?)

為何理工大學會變成國粹派大本營，我就不太了解，後來我在 KATSO 的時候，我只知道理大學生會不喜歡我們，會撕掉我們的海報，所以我們去學生會抗議他們撕毀我們的海報；另外學生會負責撥款給不同的屬會，KATSO 每年肯定是獲得最少的，因為我們跟理大學生會的路線不一樣。學生運動政治化就是這個意思。所以當年如果要說滲透要滲透和加盟，其實來來去去只有數個人。

(現在的學生運動跟以前的學生運動的大環境相差甚遠。)

是的，過去的學生運動能夠組織到基層，例如當年艇戶事件，KTIS 的義工都是中大、港大的學生領袖，當年我們十一個人因艇戶事件被捕，而且連續三屆 Young Christian Students (YCS) ⁱ的領袖都在這次艇戶事件中被捕，包括張彩雲。後來很多 YCS 的成員，例如張彩雲都有加入《曙暉》，所以彩雲跟馬國明都很熟絡。

(早期有沒有跟基督教組織合作?)

基督教協進會都有聯絡，我印象中基督教脈絡內，協進會是比較進步的，因為當時基督徒學會仍未成立。基督徒學會、女協都是八十年代的產物，七十年代比較地域的基督教組織就是基督教協進會，有一個叫 DAGA，Documentation for Action Groups in Asia，彩雲曾在 DAGA 裡工作，是有基督教背景的；還有 CAW，Committee for Asian Women，這些地域性的辦公室，有基督教、天主教的，也就是所謂合一的。以前我做的合一，都是天主教和基督教合運動的產物，例如 CAW 是附屬於基督教協進會，但又有修女在裡面工作，所以當時並沒有分得太清楚。比較活躍就是劉千石的(CIC)Christian Industrial Committee；天主教青年聯會的《邁進》。當年刊物很多，我們當年寫很多東西，一個小團體都會自己出版刊物；另外你讀港大學生會的學生報《學苑》、中大學生報等，你從這些學生報中可以看到一些事件；如何社工方面你可以閱讀《澎湃》，我當年都在《澎湃》投稿，有很多激進社工。1 月 7 日我們被捕，其實四月有個小孩子在避風塘遇溺喪身，當年我們有一個抬棺行動，所以抬棺抗議並非源自長毛，其實是艇戶事件的社工抬住小朋友的棺材，穿上黑西裝，就把棺材抬去房屋署請願，當時警察說要保留拘捕我們的權利，當時我們就是公民抗命，刻意不申請，所以一班社工界的人、CIC 等做社區工作，而且較激進的、前衛的人士，就組成一個「社工關注艇戶聯委會」，然後用這個名義去組織社工去參與這些社會運動的事件。從《澎湃》中你可以看到社工在思考到底應該要改良還是要改革等問題。其實艇戶事件後，警方都多次用公安法去拘捕居民去收地，就是當年粉嶺安樂村事件，當年殖民政府直接用暴力，丟催淚彈趕走居民，現在政府則用諮詢，其實都是隱性的暴力，其實更難去處理。當年學生變得如此激進，就是因為見到很赤裸的殖民統治，所以反殖路線的出現都是回應很具體的處境。

ⁱ 天主教中學生的組織，這些曾是 YCS 的領袖入大學後，來 KTIS 的人都是來自這些背景。